

## 父爱如海

秦志燕(执笔) 秦志云\*

父亲去世已近八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越来越清晰,我常常想起一些过去的生活小事和他的言谈举止,是那樣的親切和難忘。

在我家的書房裡掛著一幅父親所畫的我小時的油畫,看起來我很不高興,噘著小嘴,抱著一個洋娃娃,這讓我想起了我們在抗日戰爭時期住在重慶鳳凰山的一些趣事。

抗日戰爭時期,父親隨他任職的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南遷輾轉至重慶,住在鳳凰山上的小平房裡,和吳作人、王臨乙、呂斯百、李瑞年、常書鴻等藝術大師為鄰,那些小平房是重慶教育學院為這些老師們提供的宿舍,每家一兩間房子。這些大師們每天都要上山下山去學校上課或進城辦事。沒有自來水、電話,雖有電燈也是經常停電,幾乎每天晚上都得點蠟燭,生活雖然艱苦,但這群藝術家卻未失去對未來和生活的信心,他們將一間比較大、比較高的屋子當作共同畫室,經常在那裡作畫、切磋技藝,還互相作模特畫對方,父親的《吳作人像》、《李瑞年像》等畫作就是在那間畫室裡畫成的。他們都是留學法國的師哥、師弟,所以在交談時經常用法語,時間一長,母親都能聽懂六七成,他們之間的交談是非常風趣和幽默的,常常開懷大笑。一次,不知從哪裡知道有一處地方可以弄到剛剛出生的小乳豬,這勾起了這些留法老師的饞蟲,竟想到了要吃烤乳豬,因為王臨乙先生的夫人王合內是法國人,便由她主廚,幾位畫家七手八腳地忙活著,居然將小乳豬烤了出來,美美地吃了一頓,在那物質生活非常貧乏艱苦的抗戰時期,真可算是盛宴大餐了!

重慶的老鼠很多,鳳凰山上的老鼠尤其可恨。藥餌、鼠夾、家貓等都治不了它們。至今我還記得一件事,那年我快要上小學了,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忽然,什麼東西掉在我身上把我驚醒了,我吓得大叫起來,父親母親趕快跑過來一看,原來是掛畫的繩子被老鼠咬斷了,畫正巧掉在我身上,一只形體碩大的老鼠正肆無忌憚地在我床上跑來跑去,氣得父母雙親大罵:“四川耗子欺人太甚!”後來父親與藝術家鄰居談論此事時,大家都吓了一跳,但也想不出好辦法,不知哪位畫家說了一句:“要是老鼠肉能吃就好了,不愁沒有人逮它。”於是七嘴八舌獻計如何烹調才有可能好吃,有的說紅燒,有的說燒烤,後來媽媽說:“難道你們真要來一次像上次烤乳豬那樣的烤老鼠?”大家才哈哈一笑,從這也可以看出,即使在那樣艱難的日子裡,他們仍然充滿了樂觀的情緒。就是以這樣的心境,父親在鳳凰山上創作了《母教》、《鬧元宵》、《食為天》、《重慶雪》、《梯田》、《霧鎖重慶》、《都江堰》系列和《鳳凰山風景》系列等重要作品,使得他的油畫創作達到一个新的高峰,家中那幅小時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是呀,那麼小的孩子怎能老老實實地坐在那裡當模特呢,小嘴當然要噘起來了。

在那抗戰困難的時期,我家因為人口多,生活更為艱難,二妹、三妹出生時,母親奶水不

\* 作者為秦宣夫的長女和三女。

足,两个妹妹由于营养跟不上,经常整夜啼哭,哄也没用,母亲只好一夜抱到天亮,父亲也没法睡觉,把哭闹不止的女儿当作模特,画了许多速写、素描,非常生动,其中《幼儿》和《幼女》是最出色的代表作,画中,小女的委曲、天真的神情人见人爱,这些画作多次在父亲的作品展览会上展出,观者无不驻足称赞。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严父,他对子女的爱是藏在他的小胡子后面的。我上小学时,学校在凤凰山下,从石子路下山,过一座小桥才能到达,父亲母亲带我走了两遍,以后我就独自上学和下课回家了。晴天还好走,雨天就困难了,妈妈很担心,让我别去上学了,可父亲却说:“从小要能吃苦,长大才有用!”等我满身泥巴地回家时,父亲老远就在家门口等着了,他其实也是心疼女儿的。父亲很注重对我们的品格培养和教育,从幼儿开始,清晨第一次见面,必须学会问候长者,若哪一天没有做到,马上就要受罚,甚至要跪在画室里反省,直到养成习惯为止。为此,我们没少掉过眼泪罚过跪,他还养成我们良好的举止和习惯,如: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饭时脚不能放在桌外,不要大声说话;吃菜时,人多菜少要互相照顾和谦让;筷子吃干净才能夹菜,否则既不礼貌也不卫生;公共场合不要高声谈笑等。这些看似小事的举动和要求,天长地久,良好的品格和修养就形成了。虽然我们小时候很怕父亲,不能理解他的用心。但当我们长大之后,却体会到父亲对我们深深的爱。

我们长大后,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业和未来,他看重的是我们对学习的自觉性、兴趣和能力,从不强迫孩子做功课,更反对死读书。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学什么,要紧的是真正学明白、弄懂,知识就是你的了,也不会忘记,不要自欺欺人。”中学时,我的外文学得不错,经常受老师表扬,但父亲却不满意,因为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到了高中时,由于政治风云变化而改学俄文了,尽管考试成绩不错,但实际上却没学到多少东西,父亲认为由于这样的原因而改变学习计划是短视,对孩子是浪费时间,他要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他说的是多么正确。

父亲也很注重对我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比如:认真练习毛笔字,学校上的习字课完成了,寒暑假还要坚持练习。在50年代,父亲发现我们读外国小说和看前苏联电影较多而对中国的京剧却一无所知,就特意买票带我们姐妹去看京剧,教育我们说“不能忘了老祖宗!京剧是国粹,起码要感受感受。”因此我们非常幸运的看过梅兰芳、谭富英、马连良、梅葆玖等京剧大师的精彩表演,使我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直到现在还受益匪浅。

父亲是学画的,内心深处,当然是希望他的女儿们能有人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却不赞成我们学画,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自身条件不突出,学是学不好的,父母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强要子女去从事并不适合他们的事业。相反,他很支持子女们自己的选择。志云从小酷爱音乐,很小的时候经常趴在大学钢琴教室的窗口听老师弹琴,家中没有条件买钢琴,她就在桌子上画一张琴谱学着弹。在她考上高中时,得知南师院音乐系开始招收初中毕业生连读大学音乐系,就一心一意想去报考。但此时她已经为高中录取,必须放弃录取重新考试,而那年高中特别难考,所以重考一事需慎重考虑。父亲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做出了同意志云放弃高中资格重新考试的决定,她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记得父亲说过:“一个人能对一件事有持久不变的兴趣是很不容易的,将来不论达到多大的成就,他是终身不会后悔的。”的确如此,妹妹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一直与钢琴为伴。三妹志钰高中

毕业,原是被保送上军事外语学院,但她自己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父亲也是欣然同意她的选择,现在三妹已成为著名的女导演及编剧了。

同样的,“学要真学,做学问要做到货真价实”的观点在他自己身上也鲜明地表现出来。“文革”前,由于国内、国际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的原因,油画等西洋美术的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改画中国画呢?他却回答说:“你以为改画国画那么容易吗?没有自身的功底和修养那是画不好的,我自己的国学、书法、金石等方面的基础都不厚,你看,傅抱石的金石、徐悲鸿的书法、谢稚柳的鉴赏力,那水平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他们的画才好!再说,西洋画又错在哪里呢?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国内的油画家们不都创作出了惊世的画作了吗?谁又能否定得了呢?”

父亲是国内公认的西洋美术史权威,但他生前没有带过研究生,系里领导很希望他招收研究生,母亲对他说,你就带几个吧,否则一肚子学问也无人继承,他却说:“不是我不想带,实在是条件不够,国内,资料弄不到;原版书买不到也买不起;原画看不到;学生外文底子薄,怎么研究西洋美术史?这岂不让学生受苦受难吗!”是的,父亲没有赶上现在的好时代,等到9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形势大好时,他已是力不从心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他的这些见解和精神以及脚踏实地的努力实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子女及后代。我们家,以父亲为首,共有四人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待遇,两人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第三代也努力奋斗,都是研究生或大学毕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已成长为骨干力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父亲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跌宕起伏,他对人生和生活的真知灼见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而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艺术事业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以及做学问严谨认真的精神。父亲生活和工作的年代,极左思潮严重,他所擅长的油画和西洋美术史长期受冷遇,他的心情和思想当然有很多彷徨和苦恼,但他并没有沉沦于其中,却总是在生活中寻找希望,寻找美好的东西。父亲那一代人,从50年代初起,为了“改造世界观”,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特别是搞艺术的人,被要求到农村、工厂接受改造更是家常便饭,父亲在这些运动中,仍抓住一切机会作画,画农民人物,画生活场景、风土人情,画劳动生活。从他留下的画作上可以看到在句容农村土改时的“忆苦思甜”大会和朴实无华的农户院落;戚墅堰机车厂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苏州龙桥大队的田野和劳动特写;苏北大运河上雄伟的水闸和秀丽山川;兰考农民饱经沧桑的面容,等等。一张张画面不仅可以看出画家的深厚功底,更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壮美大地热情讴歌。这些作品,不论是油画、水彩还是素描都透出一份心境,一种愿望,一片深意,画面栩栩如生,力透纸背,令人难忘。

建国初期,经常需要画领袖人物像,父亲积极认真地参与。一次,他画毛主席肖像,这是为庆祝国庆而放在南京新街口的建筑物上很大的一张画,他找了很多毛主席在各种场合不同姿势和面容的照片,画了大量素描稿,但他仍然觉得不满意,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看照片真是不好弄。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画人物,面孔像不像倒是好办,重要的是神气像不像,人物画最重要的就是传神!那次,我和妈妈特地到新街口去看他画画,只见他站在离地面有三、四层楼高的平台上,反穿着画衣,全神贯注地挥动着画笔,时不时地向前或向后移动着脚步,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是站在那么高的台架上,这种追求艺术真谛的不懈努力,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艺术源于生活,父亲非常重视写生活活动,抓住一切机会去旅行写生,这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记得的就有抗日战争胜利的峨眉山之旅、新中国建立前夕的青岛之行、50年代末的苏北老解放区体验生活、1963年杭州的采风写生、1964年的兰考农村体验生活、1984年的桂林故乡游、1986年的庐山行和美国探亲旅，直到1989年在南京的写生，此时他已是83岁的老者了。每次写生都收集了大量的素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963年到杭州，他沉醉于江南水乡的灵秀，创作的激情喷薄而出，在四个月内他画了六十多幅杭州和富春江的油画风景，后来在1965年举行的“秦宣夫作品展”中，这批画获得极大成功。此时他已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国内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但他仍不满足，他曾满怀希望地说“我若能一年画六十张，苦干十年，我的风景画就会有一定基础了。”可惜的是，不久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这希望完全粉碎了，但他不气馁，“四人帮”倒台后，1984年他争取了去桂林的机会。他曾对我们姐妹说过“桂林是我的家乡，可却一直没有机会画她，若这次再犹豫的话，我会遗憾终身的！”南师大美术系的领导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派了当时的系主任油画家徐明华先生和他的研究生胡鹏老师一起去照顾他。他们很愉快地在桂林生活了一个月，父亲画了大量水彩和水粉画，把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非常得意地对我们说：“我的水彩水粉甚至比油画更出色！”到了晚年，由于年事已高，不能再出远门，他便和母亲二人相伴游南京，画美景、民俗。他的老友吴作人先生曾谈到这点：“现在，我们中间（注：指吴先生的画界老友）只剩下秦宣夫一人还拄着拐杖，提着画匣徜徉于南京的湖畔林间。”1995年，他得知西班牙大画家达利的绘画在上海展出，他执意要到上海去看，那时他刚刚病愈不久，身体很虚弱，医生和母亲都不同意他去，学校领导也竭力劝阻。但他的理由是：“达利是现代画派的代表人物，我是搞美术史的，这么好的机会能看到原作，死了都值得！”并且自己整理了一个小包就要到火车站。无奈，母亲只得叫他的外孙和外孙女婿护送去上海，回来之后他十分满足。我们都认为他年纪太大，用不着这样认真，他却说：“‘老’是理由吗？只要能动，就要争取。”正是他一生从不间断从生活中吸取养料，不脱离社会，不脱离时代，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阅历，艺术创作得到永不枯竭的源泉，艺术形式不断创新。在他晚年创作了大批“独幅水印”作品，看似简单、抽象，却真正达到了随心所欲、信手拈来、炉火纯青的境界。“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精神在父亲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了，人们常说，父母的身教言行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们是有深切体会的，这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

同样，他写文章和编写西洋美术史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为了一个史实，一个观点，他要看好多参考书，反复论证，决不轻易下结论。他看过的书写满了眉批，有惊叹号、问号，有时还有草图。他留法回国时带回的书和图片一直保留在身边，舍不得丢掉。他编写的美术史讲义，稿纸有一箱子，每一章节都反复推敲，中文、英文、法文交杂，最后才清稿。

父亲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开朗乐观的人，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有一副好嗓子，他说他在学校合唱团中是唱高音声部的。年轻时他学过小提琴，特别喜欢听交响乐。他给我们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英雄交响曲，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乐曲时不时地哼唱出来，我们都听呆了。在我们还没有从贝多芬和命运搏斗中醒过来时，父亲又打起节拍哼起轻快的《蓝色多瑙河》来了。他对戏剧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就和万家宝（大文学家曹禺）先生交往，交流话剧心得。1934年他刚从法国回来，就参加了由李健吾、林徽音等人发起的喜剧《委曲求全》的演出，他担任舞台美术设计，该剧在北京协和礼堂公演，立即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在50年代，南京师范学院工会组织教师排演普希金名著《渔夫

和金鱼的故事》，父亲扮演忠厚老实的渔夫，当舞台大幕拉开，父亲戴着白胡子，穿着俄式老农衬衫，双手撒开大网出场时，全场一片惊叹，互相打听哪里找来这样一个活脱脱的老渔夫？！我们几个女儿和母亲更是兴奋不已，心跳不止，那是爸爸演的呀！那次，他和音乐系的马崇芬教授（饰演鱼娘娘）的珠联璧合演出，在南师一时传为美谈。他爱读文学作品，古今中外一一涉猎。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西游记》，孙悟空的每一次“捣乱”都让他乐不可支；武侠小说他也看得津津有味，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是从书店租来看的，两天换一本，绝不食言；书架上有翻译小说《戈雅》、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法文版的《包法利夫人》……这些书给了他快乐、享受和丰富多彩的阅历。

生活中，父亲和母亲感情极好，他对母亲的爱护和尊重几十年如一日。他对我们说：“你妈妈一个大家的千金小姐（母亲是李鸿章的曾孙女），嫁给我一个穷教授，不但没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而且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你妈妈的工笔画画得很好呢。”父母互敬互爱，共同扶持，共同营造了和谐宽容的良好家庭气氛，使得全家可以齐心克服困难，共渡难关，不为物质生活不足而烦，不为琐碎小事而恼。母亲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置自己的财产于不顾，而把父亲的画作、书籍、资料等尽力地保存下来了，这点父亲是非常感激的。也因为和睦的家庭，父亲的事业才有了可靠的后盾和愉悦健康的身心，父亲能活到92岁的高龄和这也是分不开的。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但他扎根于自己的土地中，默默地、勤奋地耕耘，凭着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永不满足的追求，怀着一颗艺术家真诚的心，终于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画家、教育家。这是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最值得骄傲的，也是永生难忘的。

2005年10月21日

### 外一篇：父亲眼中的文化名人

父亲生于20世纪初，逝于20世纪末，是一位世纪老人。他与20世纪中许多文化名人都有过交往。

还是在天津上南开中学时，他就与文学大师曹禺认识了。他们是年少英俊的中学生，都喜爱文艺活动，对话剧特别感兴趣，经常交流心得。60年代，三妹志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寒假回家时，父亲问起她的学习情况，她说她正在排演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她演四风，父亲非常高兴，当时就叫她表演一段。三妹听到父亲与曹禺先生的往事也非常高兴。虽然是在家里的小屋子里表演，却非常投入。演完之后，父亲高兴地说：“很好，演得好，没把家宝（曹禺原名）老弟的作品玷污了。”我看到他们二人的眼中都闪烁着激动的泪光，一个是为了四风的命运，一个是为了珍贵的友谊。

20世纪30年代，可谓是中国走出国门打开眼界的第二次高潮（第一次是满清李鸿章开启了派遣青年学子去欧洲、美国留学的大门），许多热血青年来到了巴黎，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在法国，他先后和徐悲鸿、常书鸿、吕斯百、吴作人、李健吾、吴宓等人结识，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时间之常，感情之真，非常令人羡慕。

吴宓先生在1930年从莫斯科到巴黎。在到巴黎之前,他给父亲发了电报,一对校友和好友在巴黎车站见面了。他们一同游览巴黎,并和在巴黎的清华大学校友聚会,畅谈理想和爱好,把人生、理想和事业比做开矿。吴宓认为:“见地中似有金,乃尽全力,掷血汗之资以采掘之,卒乃所得者为铁而非金,自然失望,然使未开掘到底,又安知此中非金哉?”父亲则回答:“应注重于采掘之过程(process),而不计结果(results)之得金与否;易言之,即为寻求冒险(adventure)以前进而永不悔怒,则庶几文人与艺术家之所有事矣。”这样的信念代表了父亲那一辈热血青年对生命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追求。

父亲和徐悲鸿先生的友情和交往是从1933年开始的。那年,徐先生携二百多幅中国近、当代艺术家绘画作品来巴黎举办绘画展览,父亲和他第一次见面。父亲和挚友李健吾先生(著名现代戏剧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仔仔细细地看过每幅作品之后,合写了一篇文章《巴黎中国绘画展览》,对几乎每幅画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评论。对徐先生的作品既推崇,也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徐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他更另眼看待了。这使父亲很受感动,更加尊敬徐悲鸿先生。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徐先生接触更多了,互相关心更多了。徐先生推荐他到原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为父亲第一次个人画展写评论文章,父亲为此心存感激一生。父亲极佩服徐先生的艺术天才和作画时的忘我精神。他说:“悲鸿身子看起来很瘦弱,但画起画来力气大得很呢!就好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徐先生在重庆一段时间日夜作画,父亲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痛惜地说:“可把他苦坏了!”因为此时,徐先生和蒋碧微女士关系破裂,父亲和吕斯百先生等人都非常关心,希望他们能和好,在两人之间作了不少劝解之事,但未能如愿,对此他们是非常惋惜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徐悲鸿、蒋碧微、张道藩三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报道开始在媒体、刊物上出现时,父亲很是感慨,他有些伤感地说:“人世间唯有感情之事难以捉摸,想当初,蒋碧微不顾一切和家人闹得天翻地覆和徐悲鸿一同出走,四处飘泊,夫唱妇随,谁不羡慕!天不遂人愿,没让他们白头到老!仔细想想,他们二人性格是有些不合,难以相处。张道藩倒是个多情公子,蒋、张二人之间也不能简单地说一句:不道德。几十年来的交往,每天都写日记、通信,记下心中的感受。每张字条都保存着。没有真爱,怎么做得到!怪只怪月老系错了红线!”

20世纪30年代父亲刚刚回国时,他在清华大学教授法语和艺术欣赏。当时在北平,有一著名的文学沙龙,就是一代才女风韵动人的林徽音女士那间梁家客厅,是当时主流派文学的中心。为了打破文化界的沉闷,决定排演三幕话剧《委曲求全》。由李健吾先生担任导演,司徒乔、林徽音、秦宣夫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就此,父亲认识了林徽音、梁思成夫妇。他非常尊崇林徽音女士,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学问又高贵美丽的女子。50年代初,社会上刮起批判建筑界“大屋顶”的风暴,父亲知道这是针对梁氏夫妇的,很为他们担心和不平,他说以林女士的气傲是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的。当时我工作单位的建筑也是大屋顶,父亲说:“大屋顶不过是一种建筑风格,你们单位难道是因为大屋顶就复古、就变成资产阶级了吗?他们可是设计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呀!”对于林女士的逝世,他认为和这种打击是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著名土木工程专家夏昌世教授来我家还不由得谈起了他们,对他们缅怀不已。说他们没赶上雨过天晴的时代。

建筑大师童寓在父亲的心中占有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父亲敬重他、钦佩他,认为有这样一位朋友是人生的幸事。在“文革”前,童大师经常来我家,就会听到从房间里传出的笑

声、争论声、叹气声，他们二人有共同的性格、共同的爱好、类似的经历。他说童老看起来说话不多，但他一身都散发出超凡脱俗的风度，他的学问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拿来吓唬人的；而是化到他骨子里面，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你看童寓的素描画得多传神，他画中的建筑物是活的，这种功力就是大画家也不是个个比得上的。

他不仅看重童大师的学问，对童大师的感情生活也极口称赞，多次谈到童大师对童师母的关爱真是体贴入微。对一些影视、文学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爱情的描写十分不满，认为他们如果能把童老夫妇的爱情的精髓表现出一二，那就感人得不得了了。童夫人过世，童大师受到重创，父亲百般安慰他。一次他从童家回来对母亲说：“童老太惨了，一个人关在屋内抱着夫人的骨灰盒痛哭，谁看了都心酸。”

童大师设计作品深得父亲的喜爱，我家住在北京西路附近，父亲常指着北京西路上的一座建筑说：这就是童老设计的有名的 AB 大楼，你看多庄重大方，一百年也不会过时！后来他的外孙女的婚宴在那里举行，父亲非常高兴，这是他和童老友谊的延续。

童大师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父亲很不以为然，他说：“重要的是真才实学，出不出名有什么关系！”童大师和父亲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被历史所眷顾，共同的境遇让他们成了知心朋友。

父亲一生交友很多，他们相互尊重，相互交心，没有丝毫功利私心，从而获得了真正的友谊，给我们后辈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